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

研究所丛书

遗产·认同·表述： 文学与人类学的跨界议题

李 菲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

研究所丛书

李 菲 | 著

遗产·认同·表述：
文学与人类学的跨界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产·认同·表述:文学与人类学的跨界议题/李菲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丛书)

ISBN 978-7-5161-7567-5

I. ①遗… II. ①李… III. ①文学—人类学—研究

IV. ①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252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王 影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313 千字
定 价 7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这套丛书是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部分同仁的学术论文自选集。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成立于 1999 年 6 月，2000 年 9 月被批准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985 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的主要依托机构，也是“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所下设俗语言、俗文学、俗信仰、文化遗产与文化认同四个研究方向，涵盖文学、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 20 余人。

多年来，所内研究人员已出版专著百余种；研究所成立以来，也已先后出版“俗文化研究”、“宋代佛教文学研究”等丛书，但学者们在专著之外发表的论文则散见各处，不利于翻检与参考。为此，我们决定出版这套丛书，以个人为单位，主要收集学者们著作之外已公开发表的单篇论文。入选者既有学界的领军人物，亦不乏青年才俊；研究内容以中国俗文化为主，也旁及其他一些领域；方法上既注重文献梳理，亦注重田野考察；行文或谨重严密，或议论生新；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了我所的治学特色与学术实力。

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的关注与批评！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序 言

随着各界对文化遗产关注的日益扩展，学术界的相关研讨也在不断加强。然而如我在既往一些会议上提过的那样，遗产其实“不是东西”，即不是现实中的实存之物，而只是既有事物的被增添属性。

说得具体一些，作为遗产，无论北京郊外的长城遗址、重庆大足的摩崖石刻、嘉绒藏区的锅庄演唱，还是公立博物馆展示的文物国宝抑或私人收藏的珍奇古玩……都是人们赋予这些场所和物件的认知属性，而非这些实物本身。

这样，正在各地轰轰烈烈涌现的遗产热潮，尤其是针对谋求挤入各级别名录而展开的“申报运动”，实际是各界联手的一场变旧为新，亦即为旧事物重赋新意：通过为各类有希望成为“遗产”的事物添加文化属性，以提高它们的身价和社会资本，从而吸引公众的再度关注。

千百年来，长城遗址和大足石刻存留在它们所在之地，担当着作为时代产物的特有功能，也经受着历史变异的风风雨雨。在游牧农耕两大文明的交往互动或今生往世的信仰关联中，它们被接纳、被使用、被传承，乃至被损毁、被遗弃、被疏离；但都还是在各自实存的脉络中演变和延续。如今，经由浩浩荡荡上下结合的社会运作，它们被变成了“遗产”，获得了相对一致并可供阐释挖掘乃至开发利用的新属性。

这样，当长城、石刻、锅庄、昆曲等既有事物忽然获得“遗产性”这种新时代身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围绕这些身份含义的种种认定和论争，也即本文题目所指并与更多议题相关的认同和表述。

现代汉语的“认同”是由域外引入的新词，与英文的 Identity 对应。

但后者的含义还有同一性、特性、身份以及识别、确认等。相比之下，汉语中，带有动词和主体取向的“认同”反倒是被强化了的一种跨语际改用。比如一旦在其前面加上文化、民族或地方、国家等其他单位，组成“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等词组之后，其中的“认同”词义，就具有了从修辞到实践使二者相互叠合的功能，传达出“认同文化”“认同民族”和“认同地方”“认同国家”的意味。

仍以长城为例，自秦时中原华夏王朝为阻止“北狄”入侵而动工兴建的时候，它的基本属性是军事防御，并成为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的区隔标志。在历朝历代的现实进程里，它或起到实际抵挡之用，或因均衡打破而被跨越、被占领和被摧毁，然后又被新崛起的中原力量修复。与此紧密对应的是，在世人认知的表述传统里，同一个长城却在“孟姜女哭长城”这类的民间故事中凸显为暴政象征，一次次地被声讨、被控诉。到了今日，当其作为不同级别的“文化遗产”供游人观赏和用作国民的教育基地之时，长城又被赋予了中华民族的“遗产性”，从而升格为传统认同、国家认同乃至国家形象的重要符号。

1987年12月，长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的央视频道在随后的专栏里称其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并在感叹“岁月流逝，物是人非”后对观众说，“经过精心开发修复，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司马台、慕田峪、嘉峪关等处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在如此这般的人为努力下，“如今当您登上昔日长城的遗址，不仅能目睹逶迤于群山峻岭之中的长城雄姿，还能领略到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大智大勇”。^①可见，在遗产浪潮的驱动下，长城再次呈现了从实物到表征交错演变时代轨迹。

再看“锅庄”。在清代《皇清职贡图》里，藏区的锅庄被汉语的文献记述为：“杂谷本唐时吐蕃部落，男女相悦，携手歌舞，名曰‘锅庄’。”而在藏语表述中，它的自称为“卓”，乃“娱神”之舞，其来源在敦煌石窟和吐蕃碑石里都有记载，是“一种氏族部落娱神的祭坛礼仪和盟誓文化

^① 央视国际：《中国的世界遗产·长城》，<http://www.cctv.com/geography/shijieyichan/sanji/changcheng.html>。

有关的舞蹈形式”^①。通过对当今嘉绒地区“锅庄”状况的实地考察，李菲发现当全球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浪潮来临之时，“锅庄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娱乐民众的民间舞蹈，更被视为一种能够代表权力并产生利益的文化资源。”接下来，新的“被视为”再引申出新的“被表述”，从而将藏区文化传统中依娱神功能而自在和相传的“卓”，不但被说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而转换为国家名录里的某种列号编码，如“序号123/编号Ⅲ-20”等。这样的结果，被李菲揭示为一系列改变，被改变的“不只是表述符号，还有表述主体”，甚至还包括原本的“族群关系体系”^②。

继长城之后，中国又有一批旧而新的“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名录。1999年12月4日，“大足石刻”增列其中并被授予专门的标牌。牌上以英汉双语写道：一处文化或自然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对其独特或普遍价值的确认。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需加以保护。

这样的表述，不仅揭示了“遗产性”内涵——确认某物独特或普遍的价值，而且阐明了命名目的——呼吁、要求和规定对人类的利益实施保护。

不过十分明显的是，此处针对的只是抽象的“遗产”，亦即被赋予的新属性，而丝毫未涉及大足石刻本身，既没有谈到它既有的宗教功用，也尚无涉及其当下的信仰传承。这就导致一种认知和实践的矛盾：一方面，所有获得“遗产”称号的事物会因价值递增而备受关注；另一方面，它们在历史长河与民众生活中的完整意义却会被扭曲或抽空。在学术研究方面也会导致一种新的危险：当越来越多的既有事物都被贴上遗产标签之时，人们的研究便有可能日益远离对象本身，而仅去追随此起彼伏被人为赋予的那些属性。

这是需要警惕的。也正因如此，我对李菲的论述予以肯定，因为她在关注锅庄、弦子、祭星等文化事项时，不仅揭示它们被作为“遗产”后的多重演变，而且同样深入完整地考察分析了其作为族群和地方传统的自在

① 李菲：《文化符号竞争：遗产名录与族群整合》，原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② 同上。

意义。这样，两相对比，就使人得以窥见当今世界的交往体系中，同一事物相互依存的虚实两面。

这本著作以“遗产·认同·表述”为题，力图兼顾事物与问题的多个面向，分别探查所述对象的实和虚。全书由三部分组成，总体以“遗产”为线，沿着器物、景观、口述、记忆和身体实践等领域展开辨析，首先确立了文化遗产知识反思的基本立场；继而聚焦于特定历史场景中的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用作者的话说，是想由此而贯穿“族群认同、历史记忆与文化表述”的核心议题；最后着重展现了“人类学田野考察”的践行与体悟，空间跨度从西南一隅的嘉绒藏区到中原的黄土高地直至海峡对岸的绿岛景观。作者的观察由具体的事象而起，以扎实的思辨作结，体现出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脉络与师承，而在所论及的“表述与记忆”及“身体与传承”等问题上，又凸显了新生代学人的拓展和推进，值得关注，值得赞许。

是为序。

目 录

序言	(1)
----------	-------

文化遗产研究

文字中心主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反思	(3)
身体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范式转型	(17)
口述	(33)
遗产:历史表述与历史记忆	(49)
文化符号竞争:遗产名录与族群整合	(65)
对话:在人类学遗产研究的国际平台上	(79)

文学与人类学批评

新时期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理论推进	(93)
民族文学与民族志:文学人类学批评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	(107)
以“自述”之名:一个“实验民族志”写作个案 ——刘尧汉与《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的 叙事建构	(120)
文化记忆与身体表述 ——嘉绒跳锅庄“右旋”模式的人类学阐释	(134)
空间观念与族群认同 ——康藏民歌“弦子”的文学人类学研究	(149)
跨学科整合研究之垦拓 ——宗白华与中国早期比较文学刍议	(203)

人类学田野现场

灾民安置与社群重建

- 都江堰市翔凤桥社区安置点 6 月 4 日实地调查与思考 (221)
- 族群遗产的现代变迁:基于嘉绒跳锅庄的田野考察 (238)
- 黄土文明地方信仰的历史建构与认同实践:以介休张壁村为个案 (250)
- 黄土社会的多元互动与区域整合:介休张壁村的祭星仪式考察 (270)
- 绿岛,绿岛:旅游景观与历史记忆 (291)

文化遗产研究

文字中心主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反思^{*}

摘要 作为西方社会的发明之物,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中的物质中心主义话语已经在众多反思中得到了相当的揭示。与此同时,“文字中心主义”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第二重中心主义话语。不过,其存在方式在遗产话语建构中相对隐秘:其一,它以对口头言语文本的强调取代了书面语言文本的核心地位;其二,它使“口头性”(语言)成为非遗类别划分的重要标准;其三,它也体现为非遗认知、阐述和保护实践中表现出的强烈“文本化”倾向。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文明文字书写传统的一种反思,只是,这种反思并不彻底。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知识生产

当今世界遗产运动从源头上看是一项西方社会的发明之物。虽然被冠以“世界”之名,但实际上是西方文化范式再一次征服非西方世界的成功案例。不论人们接受与否,赞同抑或反对,遗产问题都已是今天全世界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议题。随着遗产运动的全球性扩展以及非西方世界的日渐参与,对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反思也成为遗产知识生产、遗产体系生长与完善的重要动力。

作为西方社会的发明之物,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中的物质中心主义话语已经在众多反思中得到了相当的揭示。与此相关联,文字中心

^{*}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主义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第二重中心主义话语。不过,文字中心主义话语的存在方式在遗产话语建构中较为隐秘:其一,它以口头语言文本的核心地位取代了书面语言文本的核心地位;其二,它使“口头性”(语言)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划分的重要依据;其三,它也体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阐述和保护实践中仍然表现出的强烈“文本化”倾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文明文字书写传统的一种反思,只是颇为遗憾,这种反思并不彻底。

文字中心主义的隐性转换与“口头”优先性

一 口头传统:作为反对西方遗产话语霸权的革命性力量

无形文化遗产在联合国的相关文件中先后被表述为 oral、non-material、intangible,分别对应中文“口头/口述的”“非物质的”和“无形的”(词义或词源意义上)。它们的内涵有相通之处,又各有侧重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一定就是彻头彻尾的口头传统,但在其传承和使用中大抵也没有完全脱离口头表述。也就是说,“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一直是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一环。^①而对无形文化遗产“无法记录下来的”(unrecorded)、“没有书写下来的”(unwritten)等特质的强调,也说明口头传统是相对于书写的、记录的文字传统而存在的。无论是从遗产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其诞生的生命史来看,无形文化遗产对口头性、非物质性族群文化的重视均是作为意识形态意义上反抗西方权威中心话语的一种革命性力量而出现的。由于长期以来,口头与文字的二元对立负载了前现代/现代、低级/高级、原始/文明、非理性/理性、非西方/西方等一系列复杂而对立的社会文化含义,使得口头传统成为西方世界内部弱势边缘文化对抗主流强势文化,以及非西方世界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一种有效手段。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无形文化遗产口头传统对非文字、非记录、非书写的强调恰恰又强化了文字与口头的二元对立模型,使得这种反思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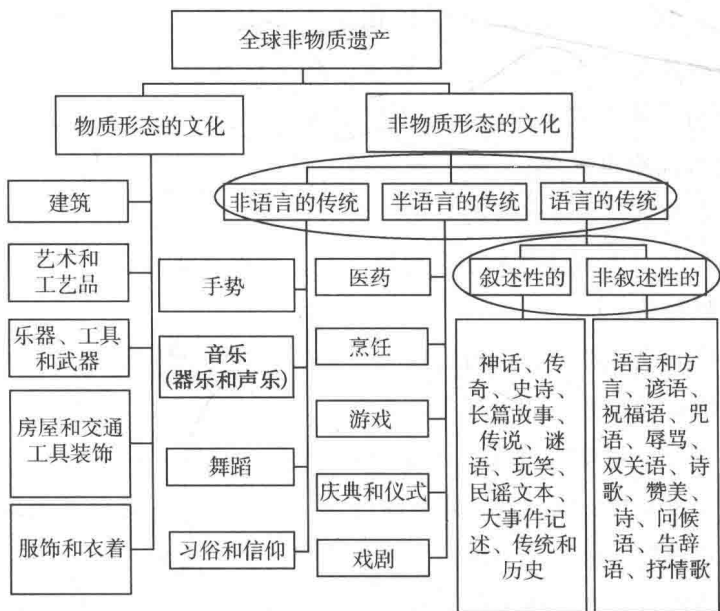
^① 朝戈金:《口头·无形·非物质遗产漫议》,《读书》2003年第10期。

终只能在文字/口头二元“大分野”^①的知识讨论框架内展开,从而忽视了文化书写的其他可能性和多元化样态。

与此同时,无形文化遗产对“口头性”的强调也在遗产体系内部不同层面导致了不同的后果:一方面它促进了物质的(以及文字的)文化遗产与非物质的(以及非文字的)文化遗产达成某种补充和平衡;但另一方面在无形文化遗产的内部构成中,却导致了对口头语言传统的过分重视和凸显。

二 语言/非语言:文字中心主义的隐匿与转移

遗产运动作为西方文字社会当下最热门的一项文化发明,在向非西方社会扩张的过程中,经由对文字的反思发现了口头传统。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987年的“非物质遗产”早期定义框架。^②



① 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大批学者,如古典学者艾瑞克·哈夫洛克、人类学家杰克·古迪、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精神分析和心灵研究专家瓦尔特·翁等,都参与到口承与书写“大分野”论争之中。西方知识界所谓的“大分野”指在口承与书写之间横亘着一道认识论意义上的分水岭。参见巴莫曲布嫫《口头传统·书写文化·电子传媒——兼谈文化多样性讨论中的民俗学界》,《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1987年“非物质遗产”定义框架结构图,参见李春霞《遗产:缘起与规则》,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页。

在由民俗学家参与并主导的上述分类框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内部的一级分类分为物质形态的文化(Material Culture)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Non-Material Culture)。而在其二级分类中,“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从存在形式和传承方式上都以语言及其使用情况为分类的标准和参照标尺,区分为“非语言的传统”“半语言的传统”和“语言的传统”,其中“语言的传统”又进一步分为“叙述性的”和“非叙述性的”。“语言/半语言/非语言”与“叙述性的/非叙述性的”均是民间文化和口头文学研究的基本术语,其下所列举的“神话”“传奇”“史诗”“长篇故事”“传说”“方言”“谚语”“谜语”等,也都是民间流传的主要文学体裁和表述类型。由此不难窥见西方民俗学在民间文学和口头传统研究方面的悠久历史背景。另外,作为一门关注口头传统的现代之学,民俗学也见证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交流方式的根本性变迁——书面文化与印刷术的日益普及。基于这样的时代烙印,口语与文字这两种知识传承方式的对立与关联就成为民俗学始终不可避免的基本学科问题与理论出发点。^①从上图图中可以看到,民俗学的参与将这种二元交织的对立与紧张也带入非物质遗产术语体系之中,尤其是在“叙述性的语言传统”与“非叙述性的语言传统”中,书面文字与口头语言的分野边界实在难以厘清。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的过程中,无论是1987年术语体系中对民间口头文类及语言表达形式的细致深入分析、1998年代表作条例中将“口头”与“无形遗产”的捆绑并置,还是2003年公约中对“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的强调,其背后都表现出一贯的深层知识逻辑:语言——这一与书面文字高度对立而又密切联系的文化的口头表达形式,在实现了自身对文字书写文化反思的同时,也占据了非物质遗产体系的中心位置,并使自身成为非遗定义和分类的核心话语。如在1989年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中去掉了上图中的“物质形态的文化”之后,直接将“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下属“语言的传统”中的某些

^① 彭牧:《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民俗研究》2003年第3期。

具体分类视为民俗的定义。^① 1998 年代表作条例将“口头”与“无形/非物质”两个概念加以并置捆绑则更成问题:我们无法否认“口头”的必然是“无形/非物质”的;更无法反过来推论“非物质”的都必然是“口头”的。这显然是一种顾此失彼的表述逻辑。此外,在 2003 年公约文本中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的五大内容。其中第一类“①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与后四类;“②表演艺术;③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实践;⑤传统手工艺”之间,仍然可见源自 1987 年非物质遗产术语体系中的“语言/非语言”这个潜在的划分尺度。

文字中心主义由此脱掉了“书写”形式与“书面”材质的外衣,转换为注重口头性的语言优先主义。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将西方传统中的“文字/口传”二元“大分野”复制到自身框架之中,在实现了对文字中心话语的反抗之后,却再生产出了“语言与非语言”的对立。“文字”与“非文字(主要指口传)”的二元对立配置项被转换为“语言(口传)”与“非语言(口传之外的其他文化表达方式)”的二元对立配置项。最终,书写文字中心话语完成了隐匿与转移,口头语言赢得了新的话语中心位置。

口头/身体:非遗分类与西方现代知识生产

人总是通过分类行为来将事物、概念、关系、力量等划分到不同归属范围当中。分类对于人类思考和认识世界、了解自己的生活环境以及身处其中的活动来说至关重要。^② 分类与体系建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其知识谱系的一个原点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问题在本质上亦是西方现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问题,因而也体现出了西方知识生产过程的某些内在脉络与特征。

① 李春霞:《遗产:缘起与规则》,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30 页。

② [英] 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 页。